

宋史研究丛书·第四辑

纤微编

◎ 王曾瑜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K240.7
2013.1

宋史研究丛书·第四辑

纤微编

王曾瑜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纤微编/王曾瑜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81097-923-8

I. ①纤…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辽宋
金元时代 IV. ①K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2693 号

责任编辑:王红梅

装帧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印刷: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22
字数:590 千字
版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
书号:ISBN 978-7-81097-923-8
定价:45.00 元

《宋史研究丛书》(第四辑)编辑委员会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曾瑜	乔幼梅	朱瑞熙	李锡厚	陈 振
胡昭曦	高树林	郭东旭	黄宽重	裴汝诚

主 编:王菱菱

副主编:王晓薇 王晓龙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善军	邓小南	包伟民	刘秋根	李华瑞
张希清	杜建录	肖爱民	杨 果	杨倩描
汪圣铎	陈 峰	姜锡东	程民生	

本书出版得到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和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说 明

这是个人的一部以中华古史研究为主的论文集,其中包括与人合作的三部史书的部分自撰章节,并作了若干修订和补充,另有若干回忆文章,有关批判学术腐败等的杂文。纤微者,古人常用以形容微小,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四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点滴编》为姐妹编。

目 录

一 治辽宋金史杂谈	(1)
二 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39)
三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士风和名节浅谈 ——以宋朝的士大夫为中心	(75)
四 三学生、京学生与宋朝政治	(95)
五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中国古代哲人为官之道	(112)
六 从古“宇宙”词义谈古人的宇宙观	(115)
七 宋元时代的淮南经济述略	(132)
八 中国古代的煤、石油和天然气	(202)
九 阿胶的故事	(208)
一〇 唐宋变革论通信	(212)
一一 关于宋朝武官、军职、遥郡等的通信	(218)
一二 电脑网络学术问答录	(230)
一三 一寸山河一寸金	(252)
一四《漆侠全集》前言	(255)

一五 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的学术成就与不足	(259)
一六 《宋代物价研究》序	(265)
一七 宋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进展	(267)
一八 研究江西地方史三十年的结晶	(270)

《二十五史新编》两志

一九 《北宋史》志	(276)
二〇 《南宋史》志	(300)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八章节与后记

二一 宋代饮食（第一章）	(309)
二二 辽、西夏、金等饮食（第二章）	(331)
二三 辽宋金代的交通与通信（第五章）	(340)
二四 辽宋金代的多种宗教信仰（第十四章）	(353)
二五 辽宋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等崇拜（第十五章）	(365)
二六 辽宋金代的巫卜（第十六章）	(379)
二七 辽宋金代的语言和文字（第二十四章）	(390)
二八 辽宋金代的生活燃料（2005 年版第四章第四节）	(402)
二九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简单回顾	(405)
三〇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2005 年版后记	(407)

《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三章

三一 绪论	(409)
三二 宋高宗时的政治和宗泽、岳飞等 指挥的抗金战争（第一编第十四章）	(443)
三三 其他风俗（第五编第十一章）	(507)
三四 忆黎澍先生	(544)
三五 忆范文澜先生	(550)

三六 忆翦伯赞先生	(553)
三七 忆侯外庐先生	(557)
三八 忆熊德基先生	(562)
三九 哀悼戴静华师姐	(571)
四〇 难忘的五年运动和学习生涯	(576)
四一 中华古史学的内行、外行和硬伤	(590)
四二 谈谈中国古代史料的标点与校勘及其他问题	(597)
四三 辽宋金史料介绍	(613)
四四 《永乐大典》对研究宋史的史料价值	(649)
四五 衙门化：大学、科研机构的沉疴痼疾	(670)
四六 再谈革除教科文机构衙门化	(674)
四七 量化考核与版面费之弊	(681)
四八 空头主编满天飞 ——《煞风景的考证之一》的续貂	(685)
四九 主编瘾和广告热	(688)
五〇 “南宋史研究空白有望填补”说不实	(692)

一 治辽宋金史杂谈

本文重点是谈如何研究辽宋金史，却不能不涉及较多的方面和问题。不仅是谈经验，也是谈教训。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专业中，研究中华古史确有相当强的专业性。有一位当公务员的在职博士生曾对我说，她自问有相当强的吸收能力，因工作需要，临时读些相关的经济、法律之类书籍，即可磨枪之后临阵。但当了一年多的中华古史博士，似乎还没有摸到门道，感觉有点苦恼，对自己配不配学古史，产生了疑问。即使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两个相近的专业而论，只怕也是由文入史难，由史入文易。

欲知山上路，须问下山人。我常说，个人治史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领域是无知或知之甚少的。对目前的学术腐败，人们口头一般可以承认，但似不能联系具体的人和事。例如有的人一门外语并未过关（依个人之见，外语过关的标准，应是能否进行专业对话），就被称为“学贯中西”，或对海外交通史“造诣甚深”。还有一句俗话，吹牛不要本钱，反正好糊弄者正是外行领导或媒体。一位前辈是中国的印度学权威，如今被普遍捧为国学大师。其实，真就所谓国学而论，他与张政烺师相比，差距确是可用“太大”两字。我曾拜读他的一篇短文。文章虽短，气魄大极了，且摘引目录上的一段话，“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

的术语。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云云。我不免在心中窃议，如果他能以“我与印度学”为题，对人肯定是极有教益的。可惜他开出了如此大而多，而无当的课题，他的学力能够胜任吗？任何再高明的学者，总有他们的短处，他们贡献于世人者，无非是扬长避短，拿出一点他人不能提供的东西，已经很不易。事实上，这位先生晚年不少作品正好是扬短避长。他当了许多只怕连自己也数不清的空头主编和顾问，又无学力能对此类作品的质量认真负责和把关，这难道是学者应有的自重吗？给人树立什么榜样？看来，某些外行领导和媒体的瞎捧，也可能把有的学者捧得晕头转向。再有一位内行人都知道是浅薄的、与我同代的治思想史者，因为当领导的虚荣心，总促使他不时发表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文字。有一回，一家报纸的编辑向我电话采访，要谈国学。我当即说，自己对先秦典籍不通，没有资格谈什么国学。不久，又在一家报纸上见到此人发表有关国学的文章。我给张泽咸先生通电话时说：“如今比我更没有资格谈国学的人，倒在侈谈国学了。”实际上，治史到了一定火候，对于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自己能够爬得多高，潜得多深，还是清楚的，应当向一切人坦白。还有人辩护说，目前就是这种风气，似不足为怪。然而在此种风气中，任何一个学者难道不是更应自重吗？

我个人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实不足以语上山之路。在此主要以前辈学者的治史经验为借鉴，结合同行们的一些真知灼见，加之个人亲历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谈点看法，仅供青年学者参考。

治史在客观上必然有一些基本的，任何人也不可能违背的原则，但在具体细节上，亦贵乎不拘一格，不必事事处处拘泥前人之成规，而应有自己的独创性。

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幾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能力，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的能力，即拥有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

换言之,对现代治史者而言,除了写作能力之外,既要有现代科学头脑,也要有很扎实的基本训练。对各个具体的人而言,可能会有某种能力较强,某种能力较弱的情况。但稍弱的方面,肯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学术成就。故青年学者在治史之初,就应当十分注意自己的三种能力得到均衡的、协调的发展。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在中国大陆,1949年之后,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然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又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任何一种好的、高明的学说,一旦被偶像化和宗教化,只能是此种学说的悲剧。尽管如此,回顾起来,自己能及早地接触,并且学了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治史大有裨益,是自己治史的一大幸运。记得我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开玩笑说,前辈陈寅恪先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确实不了解,二是对当时那种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有反感。如果他真有在天之灵,对我那样宣讲以马克思主义治史,是会接受的。人的信仰应是自由的,如果有人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我个人当然没有权力,也根本不想强迫,只能说,不要聪明人做傻事。

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第一位的,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对增强史识大有裨益。

毋庸讳言,中国大陆史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方面,是走了不少弯路。首先,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在“十年浩劫”前,也确实存在着一种视历史事实为历史哲学之奴的风尚。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史实削足适履,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不懂汉文,没有条件接触浩繁的中国史料。他们对欧洲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古史,只能从中国史实出发,加以验证,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盛行的那种凡是历史论著,必须加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语录作为标签,是不足取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如果事先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具体说法当做不可动摇的结论,或者自己预先设想了结论性的框架,再随意摭拾一些史料作填充式的注释和证明,即抽样作证,这恰好从研究方法到叙述方法,都成了先验性的结构,而有悖于上引马克思强调的基本研究方法。

为着说明问题,只能对某些前辈不敬了。在我的学生和初学阶段,有一位被奉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作品写得艰涩难懂,但唯其艰涩难懂,无法领会,我就愈以为神妙。及至进了历史研究所,为着完成某项任务,我不得不仔细研读他所著的思想通史的宋代部分,这可说是“文革”前部头最大的史学作品,也终于有所领悟。此后,我先是私下,进而公开,不止一次对人说,某老的理论架构不外乎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他强调土地国有制,用一句话就是品级性的结构,其实,说是等级性的结构就可以了,但为了提高作品的玄妙程度,就改用了品级一词。二是农民战争的思想,就是“狂暴的幻想”,此词也同样玄妙得令人不可捉摸,但他自己也不说清楚。三是古代的思想史,就套用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式,凡是他所喜欢的思想家就一律是唯物论者、异端思想家,他所不喜欢的就一律是唯心论者、正统思想家。其实,他的划定完全经不住史实的推敲。例如王安石,他的思想曾占据正统地位六十多年,哪里是什么异端式思想。王安石晚年耽溺佛教,又有什么唯物论。某老的理论架构的最大弱点,就是抽样作证,只摭拾对自己论点有利的史料,而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有时甚至杜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史料。其实正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先验论的方法。他也因此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邓广铭先生《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中有一段话,虽为1942年所写,对此类情况确是深中肯綮:“凡抱持一种狭隘的历史观的人,莫不强史以就我,对于所有与自己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材料则必视若无睹,因而一般标榜唯物论的人们,常是成了最为唯心论者,肆臆而言,架空立说。”^①

目前的问题,一是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史学家,是以利己主义的心态,兼以实用主义的手段,去歪曲、篡改、阉割或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在此不必多说。二是很多中青年史家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取冷漠、不屑于学习的态度,在此须要多说一点。

一次与博士生讨论选题的偶然机会,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竟成了还多少愿意用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遗老。那位青年学者很有才华,并且勤奋。他的选题是宋代东南的官民社会,但他却全然不知自己的选题正应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的基本理论着眼。此事引起我极大的震动,我与著名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明史兼杂文家王春瑜先生,辽金史专家李锡厚先生,还有前山东大学副校长乔幼梅大姐通电话,表示自己的感慨,说如果我们青年时代选这样一个课题,肯定会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着眼。他们也深表同感,深以如今的史家远离马克思主义为叹。因为官民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正是抓住了官民关系最本质、最重要之点。治史不能抓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我们认为,这是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因而影响治史质量的一个实例,但也许有的学者不以为然。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很勤奋又很有才华的学者,介绍本人的新作。我提了一点意见,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应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出发。这位学者客气一番,实际上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事后一位研究生说,在场的大多数研究生也不以我的意见为然。会

^① 《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后,我与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一起进餐。我说,那位先生确实很善于思考,对古代官吏层次的划分提出不少新的想法。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看来,其理论架构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没有考虑在史料中反映很少,却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虽然在史料中很少反映,但我们在治史时应当胸中有数,而且应当纳入理论架构之中。不能只盯住占人口大约百分之十以下的官吏,应当看到还有大多数受苦受难,却是整个社会文明基石的农民。黄先生当即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我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给一位研究生选择了宋代地方政治的课题。事后有先生对我说,在答辩时,这位研究生感受到压力,担心自己的论文过不了关。原因是一些先生认为,其论文对宋代地方政治描绘得过于黑暗,认为应当多写点光明面。我后来说,如果论文将宋代地方政治写成以光明面为主,我这个老师是通不过的。其实,即使是宋人也承认十官九贪的根本情况,地方政治又如何能以光明面为主?其分歧点,无非是如何对宋代阶级社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作总体的、基本的估价,马克思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等级授职的批判灵不灵?依我之见,在中国古代,除了如贞观之治等个别时代,地方政治可能是以光明面为主,其他大部分时间,只能以黑暗面为主。既然是在同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历朝历代的地方政治只能是大同小异。如被某些人艳称的清朝康、雍、乾时代,地方政治很黑,根本无法点缀所谓的“盛世”。此次争论其实还是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理论是否知晓,是否理解,是否运用。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一部宋代的重要史料。所谓“名公”,就是一些清官,他们的司法判案,就是具体的司法实践。南宋后期,将他们的判案编集成册,以为范本。但是,即使就这些书判而论,对地方豪强,即宋代黑社会势力的惩处还是偏轻的。我曾问一位研究生,此书所反映的,是否是宋代司法实践的普遍情况?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宋代社会既然存在着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存在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在十官九贪的情况下,司法

腐败必然成为司法实践的主流。故《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反映的，只能是宋代司法实践中很少量的、较好的情况，而决无普遍意义。与上引的地方政治相似，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有如此的估计，而此类估计其实正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若干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不应夸大为可以解决治史的一切问题。但是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范畴内，用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肯定有差别，甚至有很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我所见的一些论著，凡是涉及此类问题，而又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者，确实说不上有真正的科学价值。

过去推行马克思主义治史的排他性当然是不对的，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学术，都应认真学习，吸取其营养。例如上世纪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辩”讨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其治史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包括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说是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择善而从。

择善而从是很重要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未受史学基本训练者，从自己的学科中，想出了所谓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点。其方法并非是从史料中进行认真的爬梳，而是从今人的历史作品随意摘取合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是前述的抽样作证，拼凑成书。尽管受到一些外行领导的吹捧，但到头来，还是不可能成为真正有科学价值的作品。如果仅将某种学科的理论，当做一种时髦，当做一种取巧的捷径，企图躲避艰苦的史学基本训练，决不能摘取史学的黄金果。

有些学者研究制度史，主张运用现代西方行政学，这当然是好事，提出要研究活的制度史，更对人颇有启发。但是，目前西方行政学的前提，是在直接选举条件下的法治，而中国古代的基本情况，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和人治，存在着重大差别。即以信息传递而论，传递是否通畅，必然被阶级私利下各种各样既得利益所制约。宋朝法律规定地方官有灾必报，但秦桧独相

专权时，为了装饰所谓中兴盛世，知法犯法，反而要处分上报灾异的官员。比信息传递系统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信息传递的窒碍，何以有如此五花八门的虚报、瞒报之类。即使作了上述研究，至多也只能是活的制度史的一部分。信息传递不可能成为研究古代制度史的基本问题，似不可能从根本上激活制度史的研究。所以我提出，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法治是法大于权，人治是权大于法。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法制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其基本状况是统治阶级往往以私利粗暴地践踏自己制订的法制。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

大凡一门学科，只有在数学全面的、彻底的介入的情况下，方能成其为精密科学。目前有人嘲笑中医，说是不科学。其实，即使是目前的西医也只能说是半精密科学。准确的说法，应为中医是科学，但不是精密科学。历史学当然更不是精密科学。我曾问一个数学家，大家都是“文革”的过来人，研究“文革”，能不能运用数学公式，他只是苦笑和摇头，承认不可能。

择善而从，就意味着无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现代科学的理论，都不能削足适履。还须重复前面的一句话，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

以上的举例绝对是恳切而善意的。然而说不说在我，听不听从由人。大凡听不进去的一些史家，事实上认为已有足够的高明，根本不需要学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今的世道，做好好先生，凡事好，好，好！是，是，是！是受欢迎的，可以大家一团和气。若要说点逆耳之言，难免令人不快，甚至反感和讨厌。但是，不说似乎更不合适，挑明分歧，亮明观点，引发思考和争论，也许对史学的进步，对某些青年史家有点好处。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对目前很多青年学者而言，反而成了陌生的事。依个人之见，不妨先读一点“文革”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有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之类语录，再读一